

## 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 “抱团”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刘坤 夏静 周洪双

站在三峡大坝之上,极目远眺,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今年63岁的毕家培,从2004年开始在长江支流黄柏河上清理垃圾、树枝等漂浮物,一干就是14年。这14年里,他总共清理了约3万吨漂浮物。“清漂虽辛苦,但看着一江碧水和两岸翠绿,心里满足。”毕家培说。

像毕家培这样的长江守护人并不少。在湖北宜昌夷陵长江大桥下的江滩上,经常会看到一群身穿荧光背心、手提塑料袋的志愿者,在江滩边弓着身子捡拾碎布、玻璃碴儿等垃圾。他们自称“三峡义工”,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会自发组织在长江岸边捡拾垃圾,风雨无阻。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今,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正在大力整治沿江化工企业、城市黑臭水体、农业面源污染、非法码头等,长江生态环境改善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2018年7月14日,湖北宜昌,长江水通过三峡大坝泄洪深孔下泄。

林森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

## 整治、修复、补偿多管齐下,长江水质总体趋好

在湖北武汉的阳逻港码头,一艘艘靠港的货船通过电缆与码头上的岸电箱相连,既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也看不见烟气管排出。

“以前,船舶停靠期间使用柴油发电,有时停船时间长,柴油机一刻也不能停歇,造成很大污染。”武汉新港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杨路铭介绍,目前,阳逻港正在推广岸电技术,靠港的船舶可通过岸电系统免费用电,最快几十秒钟就可完成接电操作,能够有效减少空气和水体污染。

杨路铭说,即使以后收费,使用岸电也比直接使用船上柴油机发电节省成本30%以上,减少污染物排放30%以上。

除了武汉之外,宜昌等地也启动了岸电改革。地处长江中上游分界点的宜昌,是三峡工程所在地,也是长江流域生态敏感区和长江航运转承点。目前,宜昌境内已有29个港口码头建成岸电系统,今年年底将实现港口岸电全覆盖。“江边装个充电宝,船靠宜昌扫一扫”,日渐成为一道新风景。

湖北,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沿岸曾布局了不少重化工企业。这些企业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成为困扰长江大保护的顽疾。

为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湖北省依法关停、强力整治化工企业,破解“化工围江”问题,使得长江面临的环境压力逐步得到缓解。同时,大力实施“河湖长制”,推进退塘还湖还湿,治理水土流失,加大治污设施建设力度,治理非法码头,初步构建起了长江大保护的生态屏障。

截至目前,湖北省共取缔各类码头1100多个,腾退岸线143公里,生态

复绿面积超过566万平方米,清退港口吞吐能力1.27亿吨。

近年来,不只是湖北,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均在治理长江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建立协调机制,共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今年2月,我国多个部门联合启动实施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奖励政策,到2020年,中央财政拟安排180亿元促进形成共抓大保护格局。云南、贵州、四川签订了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江苏、浙江、重庆部分市县也签署了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寇冠军说,他们着力推进长江航运绿色发展,在航道建设中,生态保护由“重补偿”向“修复与补偿并重”转变,建立并实施了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相结合的新机制。在航道施工阶段,与环保部门一起对水、声、气及水生生物进行全程监测,主动避开鱼类洄游、产卵等生态敏感时段。

同时,长江航务管理局还与水利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打击破坏长江生态和航道、岸线资源专项行动。比如完善非法采砂信息通报机制,加强联合检查,共同加强长江采砂的合理规划、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有效保护等。

如今,一批批高污染企业被关停整顿,一片片珍贵岸线重焕生机,越来越多的沿江百姓感受到“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天更蓝了、空气更清新了”。据长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辉介绍,2010年以来,长江流域水质状况总体趋好,水质符合或优于Ⅲ类水的比例由2010年的67.4%提高到2017年的83.9%。



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 记者手记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多年来,人们在江上捕鱼、跑运输,养活了自己,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环境污染、过度捕捞、河道采砂等不合理活动,导致长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长江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尤其是一些临江化工企业,大排大放,让周围群众苦不堪言。

如今,“长江病”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治好“长江病”刻不容缓。如何治?关键在于修复长江的生态环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当前,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当务之急是刹住无序开发,限制排污总量,依法从

## 治好“长江病”刻不容缓

□ 刘坤

从快打非非法排污、非法采砂等破坏沿岸生态行为。万里长江,上中下游共进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在治理长江的过程中,不仅要各自守土有责,还要在“共”上下功夫,建立健全长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体制机制,密切合作,形成整体合力。

在破除旧动能的同时,也要不断培育新动能。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决不能再走因小失大、急功近利的老路,决不能再让厂房污水横流、码头沙石漫天、轮船肆意排放的场景重现……同时,修复长江生态环境,要统

筹兼顾,稳扎稳打,切不可不顾实际情况,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尤其是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打破老百姓“旧饭碗”的同时,也要让其拥有“新饭碗”。比如,2017年1月1日,贵州省启动长江流域赤水河贵州段10年禁渔工作,考虑到渔民生计问题,政府积极帮助291户有合法捕捞证的渔民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等,实现了渔民退捕上岸、转产转业。此举既促进了赤水

## 滥采、乱占、乱排“病症”未绝,生态形势依然严峻

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鲟,生于长江,长于大海,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具有生态风向标的作用。

“多年前,每年洄游到葛洲坝下进行产卵繁殖的野生中华鲟有2000多尾,但到了2013年,数量已不足百尾。”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李志远说,长期以来,环境污染、过度捕捞、河道采砂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导致野生中华鲟的产卵规模大幅下降,也使得长江生物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

为了避免中华鲟走向灭绝,从1984年至今,中华鲟研究所已累计放流中华鲟500多万尾。在李志远看来,虽然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生态调度等方式,增加了中华鲟的种群数量,但人工技术毕竟只是辅助手段,保护长江生物多样性,最根本的是保护和改善

长江全流域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部水环境管理司司长张波指出,如果以50到100年的尺度来看待长江生态环境的破坏现象,会令人触目惊心。50到100年,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瞬间。为了一地、一时的利益而采取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必定会付出代价、尝到苦果,而且其中有些后果是无法逆转的。

实际上,长江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只是一个缩影。专家表示,历经几十年的开发建设,长江流域的生态功能受到一定损害。同时,长江流域污染排放总量大、环境风险高、环境承载总量不堪重负,部分区域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尖锐等问题依然存在,长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长江‘病’了,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对长江进行体检。”水利部长

江水委员会规划计划局局长马水山表示,目前,长江依然存在着滥采、乱占、乱排的“病症”。整体上来看,长江生态环境的破坏现象,会令人触目惊心。50到100年,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瞬间。为了一地、一时的利益而采取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必定会付出代价、尝到苦果,而且其中有些后果是无法逆转的。

马水山说,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了专项核查行动,对长江流域8802个人河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鉴定核定了6092个规模以上的人河排污口,对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水源区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58个规模以上的人河排污口提出整改要求,截至目前已整改52个,还有6个正在整改。

此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忠注意到,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影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一个严峻问题。

3

## 激发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用转型发展成果提升大保护水平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万里长江,如同一条巨龙,从青藏高原奔向东海之滨,浩浩荡荡。

如今,面对依然严峻的长江生态环境形势,应如何激发社会各方力量,各个主体参与到长江大保护中,形成共抓大保护的合力,进而治好长江“病”?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关键在于‘共’字。”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说,要加大流域环境监控力度,在共抓大保护的实际行动中树立“一盘棋”思想,做到共商、共抓、共建、共享。要深化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在内的体制改革,完善一体化发展决策机制和咨询机制,创新上中下游联合治理模式,实现沿江执法无缝对接,避免违法行为利用地区管辖权的变化而逃避法律责任。

周小棋表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尤其要加强长江城镇污水的治理,

加强化工污染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长江船舶污染治理,加强尾矿治理,让长江母亲河尽快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在治理理念上,要由开发中保护向保护中发展转变,实现以保护为前提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统筹推进‘安澜长江、绿色长江、和谐长江、美丽长江’建设。”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马建华表示,力争到2020年,长江流域防洪抗旱减灾与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水资源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初步建立,水生态文明与河湖健康保障格局基本形成,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周小棋表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尤其要加强长江城镇污水的治理,

加强化工污染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长江船舶污染治理,加强尾矿治理,让长江母亲河尽快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在治理理念上,要由开发中保护向保护中发展转变,实现以保护为前提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统筹推进‘安澜长江、绿色长江、和谐长江、美丽长江’建设。”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马建华表示,力争到2020年,长江流域防洪抗旱减灾与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水资源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初步建立,水生态文明与河湖健康保障格局基本形成,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要用长江大保护来推进转型发展,用转型发展成果来提升大保护水平,最终实现长江保护与发展的双赢。”张波说。

“我家世代都是渔民,我就出生在湖北黄冈的渔船上,打记事起就在长江上讨生活了。”今年51岁的舒银安捕了40年的鱼,也见证了长江江豚由多变少。

2017年6月,舒银安收起了渔网,报名成为鄱阳湖湖口江豚协助巡护队队员。“在我小时候,长江上哪都能看到江豚,现在不仅很难发现江豚,就连鲟鱼、河鲀这些鱼种都快绝迹了。”

1990年,3600头;2006年,1800头;2012年,1045头;2018年,1012头……近30年来,正如舒银安感受的那样,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正在不断衰减。在这背后发酵的更大问题,是长江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沉重压力。

“长江江豚种群极度濒危是多种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江湖阻隔和酷渔滥捕导致鱼类数量大幅衰减、江豚食物缺乏,快速发展的航运业干扰江豚的声呐通讯,水域污染降低其繁殖力,渔具和船只误伤江豚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说,“长江江豚是处于长江生态系统食物链顶端的哺乳动物,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它们数量的多寡,是反映长江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一面镜子。”

在许多水生生物专家看来,“没得吃”是制约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首要原因。

长江流域是许多淡水鱼类的天然产卵场,渔业资源曾经极为丰富。但在今天,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全面衰退:鲟鱼从1974年的年产1570吨到现在已基本绝迹,刀鲚从20世纪年产4000吨至近年来已无法形成鱼汛,“四大家鱼”种苗发生率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下降了90%以上,产卵量曾经从最高300亿尾降至最低1亿尾……以鱼类为食的江豚也受到了“粮食危机”的冲击。

“长江中的许多鱼类都是江湖洄游的,不洄游就不能完成它的生活史。”徐旭东向记者举例,人们熟知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会在食物丰富的湖泊中肥育,待性成熟后从湖泊洄游到长江。当水温达到18度以上,江水暴涨,它们才能在刺激下发情并繁殖,随后在长江中孵出的鱼苗又会游回湖泊。

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的绝大部分通江湖泊被人阻隔,多种鱼类随着洄游路线的消失而衰退甚至消亡,导致长江江豚失去了重要的食物来源。“由于渔业资源衰退,很多渔民为了维持生计大量使用电捕鱼、大网围、迷魂阵、滚钩等非法捕鱼手段,这一方面进一步造成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同时也造成很多江豚被误捕而伤亡。”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郝玉江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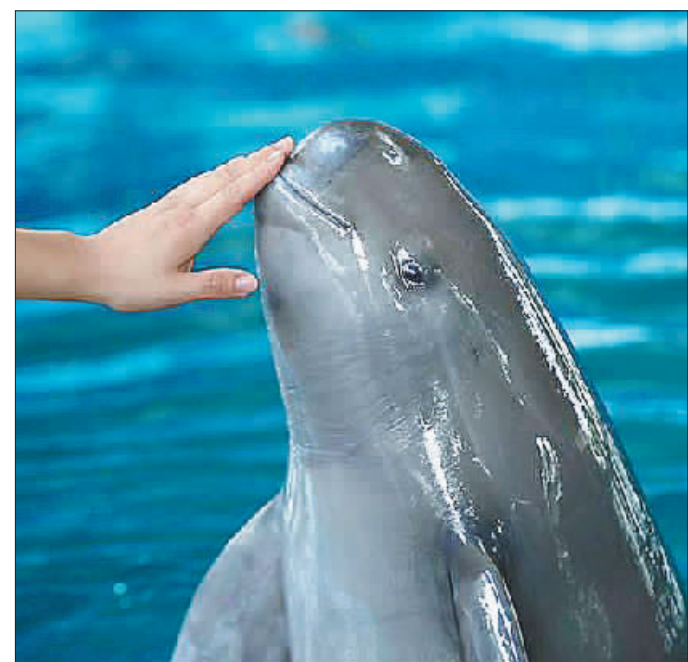
据最新数据,生活在鄱阳湖中的长江江豚约为457头,约占长江江豚现有种群数量的一半,而且在长江干流的鄂州至安庆段,即鄱阳湖湖口上下游的水域,也正是长江江豚在干流中分布密度最高的水域。

“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流域仅存的3处通江湖泊之一,自然的水文变化和畅通的洄游通道,孕育了相对丰富的渔业资源,这也成为长江江豚赖以生存的绝佳生境。”郝玉江说。在他看来,要想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一是应从国家层面根本解决渔民问题,帮助渔民转产转业,让长江鱼类资源得到2到3个世代的休养生息,以促进渔业资源的快速恢复;二是积极推动长江自然生态保护,恢复长江自然岸线和沙洲植被,在有条件的地方恢复江湖连通,营造适合水生生物繁衍的自然生境,使长江恢复其自然的生命特征。

“渔业资源是典型的开放性公共资源,极易造成过度使用的‘公地悲剧’。”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介绍,长江每年的捕捞量已不足10万吨,仅占全国淡水捕捞产量的0.15%,已基本丧失渔业生产价值。当前的长江禁渔期制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长江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大趋势。“为了保护长江江豚,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加快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是当务之急。”马毅说。

数量比大熊猫都要稀少的长江江豚,自1989年被定为二级保护动物后,保护等级尚未作出调整,法律地位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限制长江江豚保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马毅告诉记者,2014年,原农业部就要求各地按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标准,对长江江豚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措施,但想要更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长江江豚正式确定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涉及主管野生动物保护的多个部门的协调统一,农业农村部目前正在积极推进。

“保护长江江豚,就是要恢复长江的渔业资源,守护长江的生态系统。”1012头”长江江豚的最新考察结果,说明长江生态系统的恶化趋势得到了遏制。”对于长江江豚的未来,长江的未来,郝玉江认为“很有希望”。



湖北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内人工饲养的江豚。本报记者 周梦爽摄/光明图片